

从德属西南非洲到第三帝国：检验连续性假说

From German South West Africa to the Third Reich. Testing the continuity thesis

Klaus Bachmann*

摘要

德国殖民军队在德属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实施的暴行与纳粹德国后来在中欧和东欧的大屠杀之间的联系，已成为德国殖民主义学术辩论的重要议题。本文检验了连续性主张的几个要素：德意志帝国与第三帝国之间是否存在精英连续性；纳粹精英是否了解并利用了关于德国殖民地暴行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识；前德国殖民地是否在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战略中发挥了作用。作者认为，用“断裂”而非“连续性”来描述殖民精英与纳粹运动的关系更为恰当。他指出，纳粹几乎无法获取关于殖民暴力的正式知识，甚至未查阅过本可获得的稀缺机构资料。非正式知识虽存在，但往往淡化或否定暴行，因此不适合为第三帝国的决策者提供参考。纳粹在南部非洲的主要目标是使南非脱离英国的战争努力，而非重新征服前殖民地。

引言

1904 年，德国殖民当局对西南非洲殖民地赫雷罗族和纳马族的起义采取了极端暴力手段。¹ 在 Schutztruppe（专为德国殖民地部署的特种军队）镇压赫雷罗起义并将其驱入沙漠后，部队试图封锁沙漠并占领水源地。² 1904 年 10 月，Schutztruppe 指挥官洛萨·冯·特罗萨中将在演讲中敦促部队不再接受俘虏，并通过向赫雷罗妇女儿童头顶开枪阻止他们接近水源。两个月后，柏林政府撤回了该命令，并允许赫雷罗人投降而不必担心被枪杀。³ 许多人因所谓的“罪行”被绞死，幸存者则被关押在集中营，并作为劳工卖给定居者和农民。纳马人也遭遇了类似命运：他们正式投降并签署协议，但条款被德国当局违反。纳马人同样被关押在集中营，领导人被流放到其他非洲殖民地。⁴ 这些迫害导致两族人口大量死亡，消除了他们对德国在殖民地政策的潜在制约。由于冲突前赫雷罗和纳马的人口数据不准确，且战争、集中营和流放后的幸存者人数存在争议，死亡人数难以确切统计。赫雷罗族死亡人数估计在 6 万至 10 万之间，占战前人口的 50% 至 80% 以上。⁵ 纳马族在战斗中的死亡比例通常较低，约占战前人口的 20%-30%，但这些数据因缺乏可靠的人口统计而准确性有限。⁶

长期以来，这些事件在德国的历史反思中处于边缘地位。纳米比亚和南非史学界主要将其视为殖民暴力的案例，但受限于对纳米比亚在南非统治和种族隔离时期更长期历史的关注，其重要性被掩盖。在德国及少数殖民主义与种族灭绝研究者中，当赫雷罗和纳马社区成员就种族灭绝在美国法院对德国及德国企业提起诉讼时，1904-1907 年的事件才更广为人知。这些诉讼效仿了犹太索赔会议成功为纳粹时期被迫劳工争取巨额赔偿的模式。⁷ 另一个促使如今纳米比亚公众关注这些事件的因素是“连续性假说”辩论——该学派试图在德属西南非洲的殖民政策与第三帝国对中欧和东欧的占领（包括大屠杀）之间建立联系。这一假说屡被探讨、反驳和批评。连续性假说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于尔根·齐默勒（Jürgen Zimmerer）试图在今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与第三帝国“东方总计划”（Generalplan Ost）对东欧的殖民之间构建因果关系。齐默勒和巴兰诺夫斯基（Baranowski）等学者指出，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扩张正当性与希特勒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政策存在相似性，强调两者共有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德国定居者社区的作用（如西南非洲与二战中被吞并的波兰地区）。但他们避免将赫雷罗族灭绝与大屠杀直接关联，也不认为大屠杀是殖民种族灭绝的结果。⁸

后一种主张出现在通俗学术著作中，如奥卢索加（Olusoga）和埃里克森（Erichsen）充满煽动性和情感化的赫雷罗种族灭绝叙事，该书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⁹ 书名即体现作者的核心论点：他们将大屠杀视为始于德属西南非洲的政策顶点，其脉络贯穿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与齐默勒和巴兰诺夫斯基有限的连续性主张不同，奥卢索加和埃里克森的论点基于精英连续性和政权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常将不存在或边缘的联系牵强附会：

** 德国军队和文职官员在纳米比亚的所作所为如今已被历史遗忘，但纳粹深知此事。一百年前 Schutztruppe 试图灭绝纳米比亚的赫雷罗和纳马人时，希特勒还是 15 岁的学童。1904 年，他生活在一个被德属西南非洲的‘德国英雄主义’和‘非洲野蛮主义’故事所震撼的大陆。**¹⁰ 通过引用莫里茨·邦恩（Moritz Bonn）的话，他们声称“纳粹对犹太人的暴力直接借鉴了德国四十年前在西南非洲为 justify 皇帝的大屠杀而使用的种族意识形态”。¹¹ 谢莉·巴兰诺夫斯基（Shelly Baranowski）持相同立场，认为“尽管赫雷罗和纳马人的屠杀不如纳粹政权的‘最终解决方案’集中和官僚化，但对‘军事安全’的执着和对敌人的仇恨确保了种族灭绝的结果”。¹² 这是一个深远的主张，但巴兰诺夫斯基基于意识形态而非制度或精英连续性，指出赫雷罗和纳马起义导致种族排斥的逐渐激进，以及德意志帝国种族主义与第三帝国反犹太主义的相似性。几乎没有连续性假说支持者像马德里（Madley）那样直言不讳：“德国在纳米比亚的经历是纳粹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关键前奏。”¹³

这表明辩论中产生的连续性主张具有多样性。早在 1950 年代，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就将官僚制度的演变、殖民语境中种族概念的兴起（作为公民身份的替代）与欧洲极权政权的种族灭绝实践联系起来。¹⁴ 这些观点较为抽象，难以实证检验，类似将殖民主义置于更广泛的强制现代化框架中（极权主义可能被视为其顶点）的尝试也是如此。这种宽泛视角忽略了德国历史内部的连续性搜索，忽视了英、法、意殖民主义（及相应的极端暴力实践）对德国政客、行政人员和军队对待殖民地方式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其他殖民国家方法和概念的影响。¹⁵ 它也未触及瓦尔特（Walther）关于德国殖民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以及德国殖民倡导者对国家农村和经济欠发达过去的怀旧情绪——这种情绪与纳粹对资本主义的排斥相呼应，暗示德国殖民主义和纳粹意识形态可能属于一种更广泛的跨国趋势，而不仅植根于德国历史。¹⁶

将赫雷罗和纳马种族灭绝与第三帝国在东欧的“生存空间”政策及大屠杀联系起来的假说，基于若干论点，其中一些可通过经验证据检验，另一些则因未明确殖民主义与第三帝国之间的影响机制而无法验证。许多作者已追溯了 19 世纪德国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与大屠杀之间的连续性。¹⁷ 有人将德国当局在西南非洲起义后为实现安全、确保劳动力和进行社会与种族工程所采取的方法，与 1940 年代在东欧被占领和吞并领土上的做法进行了比较。

在此背景下，声称纳米比亚是“德国国家行为的试验场”难以检验，因为这预设 Schutztruppe 及德国西南非洲的常规军事和文职当局在为无法预见的未来“训练”。¹⁸ 如果存在这种联系，更可能是反向的：第三帝国的政治精英可能借鉴德意志帝国的经验，以实施在镇压赫雷罗和纳马起义及后续种族工程中发展出的方法和概念。

本文旨在检验这一主张：纳粹领导层是否借鉴了德属西南非洲殖民行动中形成的方法和概念？是否存在纳粹可参考的机构记忆？若存在，他们是否加以利用？是否存在精英连续性，使德国暴力殖民的知识和概念得以传递到第三帝国在东方的政策中？最后，我们能否识别将第三帝国与殖民时代联系起来的持续政治战略，表明殖民主义对纳粹决策的影响？

以下段落追溯了可能形成机构记忆并影响第三帝国当局的机构历史；探讨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官僚机构是否实际创造了此类记忆要素；评估此类记忆是否被实际应用，以及是否有助于纳粹制定受德意志帝国殖民游说启发的非洲政策。这将帮助读者判断纳粹帝国是否真正“受殖民主义启发”，或其战略、政策和意识形态概念是否与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思想和政策存在断裂。

为避免误解，需作如下声明：本文仅探讨个人和机构连续性、可能从德意志帝国殖民游说传递到纳粹运动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识，以及两帝国精英之间的地缘政治战略连续性。它不涉及将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与现代化和极权主义联系起来的更广泛主张，也不涉及德意志帝国和第三帝国扩张是否以类似方式合法化、关于“他者”、种族和民族排斥的话语是否相似等具体问题。分析范围限于几个可在期刊文章中探讨并通过公开资料和档案记录检验的狭窄问题。

德意志帝国殖民官僚与第三帝国的机构连续性

德国殖民贸易协会因无力保障多哥、喀麦隆、东非和西南非洲商人的安全后，帝国于 1884 年（喀麦隆和多哥）至 1885 年（德属西南非洲和新几内亚）直接接管领土管理。德属东非的行政管理六年后建立。当

时，殖民化被视为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因此负责殖民事务的是外交部的外贸部门。1885年2月，情况发生变化，专门设立了“殖民事务及部署军舰保护德国利益”的部门（Referat），文献中常称其为“殖民部门”（Kolonialreferat）。¹⁹

1890年4月，殖民部门正式成立，但其监管权很快被分割：外交部国务秘书负责与外国相关的殖民事务，而殖民部门负责人直接隶属于总理，负责其他所有殖民事务。法律上，帝国议会在殖民事务中被边缘化，只能通过辩论和投票预算及殖民相关条款干预殖民政策。殖民地不向帝国议会选举代表，政府无需议会批准具体决策。外交部和总理府的殖民决策者仅向由活跃于保护地的企业和贸易公司代表组成的特别殖民委员会（Kolonialrat）咨询。

外交部的殖民部门规模较小，但人员稳步增加。更重要的是，殖民部门于1881年3月获得军事行动管辖权，此前军事事务和 Schutztruppe 由帝国海军署（Reichsmarineamt）负责。7月，Schutztruppe 的惩罚性行动管辖权转交殖民部门，总理成为 Schutztruppe 指挥官，并将权力下放给殖民部门主任，其参谋部由两名军官组成，而 Schutztruppe 的地方部队仍由当地总督指挥。

至1902年，殖民部门已扩展至62名员工。德属东非的马及马起义、赫雷罗和纳马起义导致其进一步扩张，1907年已有176人从事殖民事务。起义还引发了殖民管理改革，这一改革在1907年2月因总理冯·比洛解散帝国议会而提前举行的选举后实施。选举结果增强了殖民强硬派势力，削弱了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对殖民扩张的批评，产生了更支持政府殖民管理改革的帝国议会。在前殖民部门基础上成立的帝国殖民署（Reichskolonialamt）即为此结果。殖民署从外交部独立出来成为独立部门，下设三个民事部门，另有军事行政人员，共107人。一战德国战败失去保护地后，许多职能不再相关。1920年4月，殖民署并入重建部（Reichsministerium für Wiederaufbau）。但四年后重建部解散，殖民事务部门重新划归外交部，其唯一任务变为：收集前殖民地信息、支持殖民研究和前殖民官员的人事事务。人员持续缩减，至1931年，该部门仅余处理热带非洲、西南非洲和太平洋事务的单位。21 1933年纳粹掌权后重组外交部，殖民事务进一步被边缘化，甚至从部门名称中消失。1937年，唯一仍涉及“殖民事务”的部门被划归“非洲大陆”事务。

在所有这些变动中，德国殖民档案至少在1924年前几乎未受影响，仅在部门间转移。1924年，外交部不得不决定保留、移交帝国档案馆（Reichsarchiv）或销毁哪些卷宗。实际仅销毁少量文件，绝大多数被移送帝国档案馆。随着殖民事务在行政中的重要性下降，越来越多材料被归档。外交部接管殖民事务后，这一过程仍在继续。1938年，大量从原殖民地移送至外交部的档案材料被转至帝国档案馆。²³

追溯这些档案的去向对本研究尤为重要。若要评估20世纪初德国在非洲的灭绝政策与第三帝国在中欧、东欧政策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需确定第三帝国统治者是否确实有机会借鉴德国殖民政府和 Schutztruppe 在非洲的经验，若有，是否加以利用。前殖民部门和帝国殖民署的档案是后世可获取的最大机构记忆载体。但档案的命运表明，几乎无人有意利用它们。大部分殖民文件被归档，一小部分被销毁，甚至连帝国殖民署的行政继任者决定保留在办公室的少量记录，最终也因公众和政治对殖民历史的兴趣减弱而被送回档案馆。

基于1924年档案筛选清单的分析显示，KA1文件（涉及东非）大多被归档，外交部保留的卷宗多与经济、地理主题相关，包括边界和划界问题。涉及德属西南非洲的KA2卷宗，仅在涉及采矿、农业、经济或行政事务时被保留。关于赫雷罗和纳马起义的记录被移送帝国档案馆并留存。据记载，乌尔姆研究者瓦尔特·伯纳（Walter Berner）于1935年向帝国档案馆申请查阅相关记录以撰写关于起义的博士论文。²⁴档案管理部门询问外交部是否对此有保留，因请求得到图宾根教授支持，故未遭反对。²⁵整理材料者显然无意保留可能在未来被用于其他语境的暴力、镇压起义或军事事务记录。但即便如此，结果也不会有太大不同。1938年，德国外交部进一步整理材料，将大部分剩余记录移送帝国档案馆。²⁶若后世政客、军官或军方决定借鉴德国在非洲的殖民经验，他们并未从这些殖民档案中获取知识。

非正式知识的连续性？

纳粹领导层本可从档案以外的来源获取殖民知识，如通俗科学文献、学术出版物，甚至诗歌和小说。如比尔特·昆德拉斯（Birte Kundrus）所示，殖民事务渗透到德国日常生活，德国殖民统治的短暂性并未阻碍专门的殖民商品店（Kolonialwarenläden）、带有殖民和种族主题的儿童游戏和童话的出现。²⁷当然，也有大量关于失去殖民地的文学作品、个人记述、回忆录和小说，包括提出“生存空间”概念的著作。²⁸但有一关键点使这些事实成为反驳连续性主张的论据。奥卢索加和埃里克森作为赫雷罗种族灭绝与大屠杀之间精英和意识形态连续性假说的最坚定支持者，详细指出，德国殖民突然终结后产生的几乎所有文献均为辩护性和否定性的。殖民回忆录和小说作者倾向于理想化和美化殖民时代，要么淡化或公开否认（或最常见的是省略）德国在殖民地的屠杀。²⁹相反，他们描绘了勇敢的德国士兵进行侠义战斗的歪曲和反事实画面，为维护其“可敬性”，不得不将敌人塑造为勇敢无畏的形象，而非惨遭屠杀的受害者。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版的大量辩护性士兵回忆录中，甚至有一些复制了随意绞死赫雷罗人的照片，但通常通过指责赫雷罗人所谓的“罪行”来正当化（justify）绞刑，并强调德国士兵的“勇敢”，而非他们的罪行。³⁰通过这些故事，后殖民态度和习俗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影响知识辩论和日常话语，但它们几乎不适合传授种族灭绝实践。它们确实有助于培养种族主义态度，促成基于排斥“种族他者”的德国身份认同，并维持对前德国非洲属地的怀旧情绪，但几乎从未包含可被第三帝国在东欧政策中应用的信息。³¹尽管这些作品采用了多种刻板印象，但“种族严格不可逾越的分离”是贯穿其中的主导元素。³²这种非人化做法伴随将非洲人视为动物般特征的倾向，从德意志帝国延续至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成为德属西南非洲集中营制度、驱逐和战争罪行的意识形态支柱，也构成中欧和东欧种族灭绝占领政策的背景，但目标群体不同：斯拉夫人、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常与共产主义者混为一谈）均被纳粹宣传视为“劣等人”，其最终命运要么是消失为雅利安人腾出空间，要么作为奴隶般的劳动力。但1933年后，重点在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而非非洲人。这种连续性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纳粹运动基于种族（而非经济或宗教）的反犹主义在内容上比纳粹作家和理论家对黑人的蔑视更具意识形态性。他们有一套复杂（尽管常自相矛盾）的理论，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疾病和全球阴谋归咎于犹太人，但对非洲人没有类似的信仰体系。³³其二，主导殖民地怀旧文学的“危险且不可靠的动物般非洲人”主流叙事，面临几种对立潮流——源于莱托-福尔贝克（Lettow-Vorbeck）在德属东非类似游击战的神话传说中的“忠诚阿斯卡里”正面刻板印象，以及受卡尔·梅（Karl May）笔下温内图（Winnetou）启发的“高贵的野蛮人”形象，这在马克西米利安·拜尔（Maximilian Bayer）极受欢迎的《奥科维》（Okowi）系列小说中有所体现。³⁴魏玛共和国的反犹文学或第三帝国的反犹宣传中没有类似形象。纳粹若想基于种族排斥非洲人，更容易借鉴古斯塔夫·弗伦森（Gustav Frenssen）的作品，其《彼得·摩尔》（Peter Moor）小说在魏玛和第三帝国被数十万德国人阅读。书中没有正面黑人主角，聚焦于年轻德国士兵的冒险及其与赫雷罗人的战斗艰辛，所依据的种族等级制度与纳粹宣传如出一辙。

殖民精英与第三帝国精英的人事连续性

许多加入 Schutztruppe 的军官和士兵是冒险家，他们渴望在战场上挑战自我，展示活力和男子气概，追求战利品和军事荣誉，期望在德国本土无法实现的快速晋升。由于赫雷罗战争中双方实力悬殊（对赫雷罗不利），战斗伤亡风险相对较低，获得勋章和晋升的概率较高。尽管患斑疹伤寒和疟疾的死亡风险较高，但这不足以吓退这些年轻冒险者。战争结束后，下一场战争已在眼前，许多 Schutztruppe 成员被征召加入参加一战的德国军队。汉斯海因里希·冯·沃尔夫（Hansheinrich von Wolf）的命运便是典型例子。他先是在 Schutztruppe 参与对纳马人的战斗，后在纳米布沙漠建造了一座中世纪风格的德国城堡，但一战爆发后立即放弃城堡加入德国军队。他受伤康复后重返战壕，在索姆河战役中阵亡。³⁵一战后，德国遣散数千名士兵，其中许多人加入准军事组织和秘密团体，阴谋反对新生的民主共和当局，并准备向夺取前德国省份的国家复仇。不足为奇的是，许多殖民军官和士兵成为这些自由军团（Freikorps）的成员，许多一战退伍军人亦然。然而，这并未使自由军团成为 Schutztruppe 的延续，至少不比它们作为第二帝国正规军的继承者更具连续性。³⁶德国经济陷入困境，这些失业士兵在1930年代大萧条中被激进化，加入纳粹冲锋队（SA）。在档案记录中，我们再次发现弗朗茨·里特·冯·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保罗·冯·莱托-福尔贝克（Paul von Lettow-Vorbeck）、尤金·菲舍尔（Eugen Fischer）甚至戈林（Göring）等名字。³⁷一些连续性假说支持者常引用这些名字，称“他们作为纽带，将德属西南非洲的殖民和种族灭绝思想与方法传递给第三帝国领导层”。³⁸

这一主张的问题不仅在于缺乏证据支持，如库赫内（Kühne）和佐尔曼（Zollman）所述。39 问题有二：方法论和实证层面。首先，若仅关注支持假说的案例，将永远无法找到挑战假说的证据。正如佐尔曼指出，支持温得和克与奥斯维辛联系的研究者通常既不考察殖民当局与纳粹领导层的个人不连续性，也不考察那些显示殖民经历与反抗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政治消极或致力于和平主义的案例。40 只有以比较方式考察所有潜在联系，才能判断哪些联系更重要。否则，很可能得出循环结论。在后一种情况下，所有殖民经历似乎都通向纳粹领导层的职业生涯，因为只考察了这些殖民轨迹。其次，即使考虑连续性假说支持者提出的证据，也会反驳他们的主张。连续性假说的盲点在于：1933 年后崛起的前殖民精英的职业生涯往往走入死胡同。但用他们支持连续性假说的作者通常聚焦其职业生涯的上升阶段，避免描述其衰落。从更广泛背景看，冯·埃普和许多第三帝国时期不太显赫的前殖民者的命运表明，前殖民精英实际上被纳粹边缘化，甚至可能比德国保持民主时更甚。在新职位上，前殖民者通常坚持强烈的殖民怀旧情绪，发表演讲并出版小册子，试图说服公众重新征服殖民地，声称殖民地如阿尔萨斯 - 洛林、上西里西亚和普鲁士省份一样，因左翼、共产主义和犹太“叛徒”的阴谋而丧失。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些殖民怀旧者组织分散在各种（甚至彼此竞争的）团体中。纳粹党掌权后，他们在冯·埃普领导下统一于帝国殖民联盟（Reichskolonialbund），埃普于 1936 年被任命为纳粹党殖民政治办公室（Kolonialpolitisches Amt der NSDAP, KPA）主任。1933 年后，冯·埃普在殖民事务中有两个强大竞争对手：希特勒的外交政策顾问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和纳粹党海外组织

（Auslandsorganisation der NSDAP, AO）负责人恩斯特·威廉·博勒（Ernst Wilhelm Bohle）。后者还担任另外两个重要职位：元首幕僚成员和外交部国务秘书。41 在纳粹国家内部的权力网络中，AO 于 1935 年凌驾于冯·埃普的 KPA 之上。根据希特勒副手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规定，AO 负责照料和组织前殖民地的德国人（冯·埃普失去此职责），KPA 则负责这些国家的殖民政策和经济措施——由于德国对前殖民地无影响力，这些措施无实际应用。此外，此类决策需经元首特使里宾特洛甫和 AO 批准。若博勒和里宾特洛甫无法达成一致，最终由赫斯决定。42 KPA 甚至在出版前需寻求里宾特洛甫的批准。43 在职位上，冯·埃普无力阻止纳粹党接管殖民组织。在德国各地，不同组织被勒令解散，成员被要求加入新联盟。如有抵抗，警方准备使用武力。1935 年后，AO 负责对南非统治下的德国人口实施“一体化”（Gleichschaltung）。44 博勒于 1937 年被任命为国务秘书后，还成功使外交部从属于 AO，并影响外交官任命。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同时作为 AO 特使，帮助掩盖其在海外的颠覆行动。对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而言，殖民议程仅用于迫使英国对希特勒的东欧计划保持中立。为实现这一目标，殖民游说团体被接管并戴上政治枷锁，使外交部能够敲诈英国，同时剥夺殖民者的任何行动能力。殖民宣传可要求归还前殖民地，但被严格禁止任何可能鼓励德国人移民的行动。德国人注定要征服和定居东欧，而非非洲。

当德国军队在战争中全面推进，重新征服或通过其他方式在击败西方敌人后重获殖民地的希望再次高涨时，KPA 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冯·埃普并未真正从这一发展中获益，因为第三帝国国家和党官僚机构内部的派系斗争中，更年轻的长期党员拥有更大影响力。当冯·埃普的机构即将升级为成熟的殖民部时，里宾特洛甫在殖民事务中的得力助手鲁道夫·卡洛瓦（Rudolf Karlowa）领事被派往军队总部，负责组建殖民军队。但国际紧张局势加剧和军事胜利的前景也引起纳粹系统内武装部队、党卫军（SS）和保安处（SD）的兴趣。KPA 将成为有权创建殖民警察部队的部门的传言，引发了党卫军和保安处与冯·埃普的竞争。最终，德国在东欧的迅速推进和北非的失败意味着冯·埃普重建 Schutztruppe 和殖民警察的计划从未实现。官僚机构继续为征服殖民地制定计划，只要国防军仍在取胜，纳粹领导层就允许冯·埃普的官僚起草未来殖民地管理的备忘录和法案。1941 年，征服殖民地的希望如此之高，以至于几名纳粹精英成员竟逐从未存在的职位。这种官僚内斗背后有一个普遍模式：获得殖民地（或收复）的前景越迫近，冯·埃普的机构可雇佣的人员越多。但这种影响力的绝对上升被其他机构争夺份额的努力所抵消。KPA 扩张越大，就越不得不屈服于更强大的参与者，后者竭力将自己的高级职员安插进 KPA。因此，冯·埃普的老殖民精英同志日益被强大的纳粹官僚机构边缘化，后者有自己的议程。直到战争结束，冯·埃普的团队仍被允许为未来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制定管理计划，但这是徒劳的，因为德国军队从未

进入任何可作为殖民地的非洲领土。⁴⁵ 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殖民地超出了德军的势力范围。然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军不断撤退，收复非洲殖民地的希望破灭，冯·埃普的计划失去了此前可能有的任何价值。1943年，纳粹党副元首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突然要求冯·埃普解散整个办公室，解雇员工并交出大楼，称政府需要所有建筑和人员加强战争努力。⁴⁶ 这就是通常被引为“纳米比亚经验启发纳粹”例证的冯·埃普职业生涯的悲惨结局。

尽管冯·埃普在第三帝国精英中地位边缘，在政治决策中处于次要角色，但他仍是精英连续性的一个典型例子，不过更多是例外而非规律。⁴⁸ 齐默勒列举了一些前殖民者在第三帝国时期延续某种职业路径的案例，他们通常加入自由军团和冲锋队，最终成为纳粹宣传者。但有两个重要原因表明，此类案例无法在殖民游说团体和纳粹领导层之间建立重要影响渠道：一是人口结构，二是统计学数据。

大多数殖民军官在纳粹掌权、希特勒成为总理时已年龄偏大。一名在镇压赫雷罗战争中20岁的Schutztruppe士兵，到1934年已50岁。那些在指挥部队对抗赫雷罗时年龄更大的军官，早在1930年代就已退休。只有那些进入政坛并加入极右翼组织（如钢盔联盟，Lettow-Vorbeck曾加入）的殖民部队成员，才有望在纳粹党、民政管理机构或党卫军（SS）、帝国安全总部（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或被占领国官僚机构中谋得职位。加入自由军团后再加入冲锋队，更多是死胡同而非职业晋升。1934年，希特勒通过大规模清洗冲锋队解决了军队与纳粹武装分支的冲突，许多冲锋队领导人入狱或被当作叛徒处决。⁴⁹

殖民游说者及其思维方式无法影响纳粹领导层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统计数据：具有任何殖民背景的德国人数量太少，无法在这个自视为不仅与魏玛、更与德意志帝国决裂的新政权中留下印记。一战爆发前的最后几年，德属西南非洲的白人人口增至14,830人。⁵⁰ 但其中不到5,000人可能亲身经历过对赫雷罗和纳马的战争。⁵¹ 此外，战前帝国殖民署有107名军官。⁵² 起义期间，Schutztruppe士兵从1903年底的756人增至1907年的近20,000人。⁵³ 这些是可能拥有西南非洲殖民经验并能将其传递给他人（包括家人和朋友）的士兵数量。1915年南非联邦接管殖民地后，居住在那里的德国人不足13,000人，其中近一半被驱逐，几乎全是被南非人取代的公务员和被拘留或解除武装后假释的士兵。他们的数量与士兵重叠，因此总体而言，魏玛共和国时期至多约25,000名德国人有德属西南非洲的直接亲身经历。他们中并非所有人都深入了解战争期间的种族灭绝事件，因为殖民地媒体仅报道军事行动，回避战争罪行和赫雷罗、纳马人（无论平民还是战斗人员）被杀的报道。德国定居者只能根据自身观察或他人描述了解囚犯命运、集中营状况或投降者待遇。1904至1908年间，温得和克的《德属西南非洲报》

（Deutsch-Südwestafrikanische Zeitung）仅31次提及“本地人”（Eingeborene），8次提及“囚犯”（Gefangene），但从未刊登一篇关于集中营条件、驱逐或处决的文章。⁵⁴ 许多德国定居者在南非联邦接管殖民地后仍留在那里，但即便全部返回，他们在加入纳粹党及1933年后的国家行政和纳粹控制的群众运动中的占比也微乎其微。仅冲锋队在失宠前就有超过20万成员；后来吸纳许多冲锋队成员的党卫军，从战前的4万成员增至1944年的90万。纳粹党在1933年停止吸纳新成员前已有近400万党员。⁵⁵ 德属西南非洲的政治和经济无足轻重，1915年前前往那里的德国人数量稀少，这使其在任何德国政权（不仅是第三帝国）中的影响力都可忽略不计。齐默勒声称殖民暴力可由有殖民背景的人传递到其他语境，这对所有有暴力背景的德国人都成立，但有自由军团参与西里西亚起义或一战前线经历的人，比有殖民或特定纳米比亚背景的人多得多。⁵⁶

殖民主义与希特勒的大战略

前殖民者通常比普通纳粹党员年长，被后者视为旧精英而遭轻视。他们的职业生涯在1933年后延续，但纳粹国家将殖民游说团体边缘化。纳粹政权新官僚体系中，外交政策和殖民事务的实际权力转移到新角色手中：外交部（GFA）和纳粹党海外组织（AO）的新领导层，AO成为处理海外德国人群体事务的关键利益相关者。由于领导层的党籍，且部分人（如博勒）在两个官僚机构中兼任高职，外交部和AO紧密交织。还有第三个因缺乏档案材料而几乎不为人知的角色——国防军秘密情报局（Abwehr）。

三者都对非洲极感兴趣，努力争取南非德国人和布尔人的同情，但既不关心殖民冒险，也不想收复前殖民地。他们另有野心：试图颠覆南非联邦，使其脱离英帝国并与德国达成单独和平协议。为实现这一目标，海外组织和外交部寻求与南非极右翼组织合作，支持反犹团体，并与对纳粹意识形态持同情态度、反对支持英国战争努力的布尔民族主义派系保持密切联系。⁵⁷ AO 还试图让西南非洲的德国人服从纳粹，但从未成功抵消南非政府对当地德国居民的影响（大多数人在 1920 年代已接受南非公民身份）。AO 和外交部未能在西南非洲德国人中建立稳固影响力的一个原因是，德国定居者不信任纳粹运动——其活动家通常是更年轻、更激进的德国新移民（Reichsdeutsche），缺乏非洲经验。作为商人和官僚，他们比依赖南非政府善意的农民和企业家更无所顾忌。

1939 年初，西南非洲流传关于德国即将进行军事干预的恐慌性谣言，称飞机在偏远秘密机场降落，纳粹特工分发武器。南非政府对托管地的动荡感到担忧，增派警力，并将西南非洲警察部队并入联邦警察。一小撮顽固纳粹分子计划夺取温得和克的无线电塔并袭击英国银行，希望引发第三帝国的军事干预，但领事卡洛瓦抛弃了他们。第三帝国无法在远离本土数千英里的地方开辟战线——这需要军队穿越英国海军控制的海域，并与可能数量更多、更熟悉当地情况的南非军队对抗。⁵⁸

但在西南非洲邻近地区，第三帝国机构实施了可能破坏英帝国重要部分的“**Weissdorn 行动**”。该行动名义上由国防军情报局主持，实则得到鲁道夫·卡洛瓦的知情和支持。他帮助招募了年轻激进的布尔拳击手罗比·莱布兰特（Robey Leibbrandt），后者曾参加 1936 年柏林奥运会，愿为推动南非加入德国阵营牺牲生命。1941 年 6 月，他进入纳米夸兰，联系了对纳粹持强烈同情、反对南非政府加入英国战争努力的极右翼组织“牛车卫队”（Ossewa Brandwag）成员。莱布兰特的目标是暗杀总理扬·史末资（Jan Smuts）和犹太裔南非商业精英，并发动牛车卫队起义。计划大胆但并非异想天开：牛车卫队有数十万成员，许多人在南非警察部队任职。然而，该组织领导层不信任莱布兰特，将其阴谋泄露给政府，后者设下埋伏。莱布兰特被捕、受审并被判刑，战后获大赦。⁵⁹

连续性假说背景下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第三帝国在南部非洲唯一的重大军事行动由与殖民游说团体无关的机构实施，几乎没有有殖民背景的德国军官参与。若说筛选参与南非颠覆行动人员有任何标准，那可能是有在南非的经验，而非德属西南非洲。博勒父子、卡洛瓦和当地以外交豁免权庇护纳粹行动的外交官都曾在南非工作。尽管 AO 和外交部在西南非洲有影响力，前德国殖民地在其战争计划中毫无作用。若因政变在比勒陀利亚建立亲德布尔政府，西南非洲重新落入德国手中，纳粹会将其视为意外之财，而非努力的最终回报。

结论

德国在东欧和南部非洲的灭绝政策之间的相似性，并非源于精英连续性或殖民机构经验向纳粹党或第三帝国机构的传播。事实上，情况相反：来自德属西南非洲的殖民怀旧者被纳粹运动边缘化和孤立。即便纳粹领导层有意借鉴冯·埃普等人对赫雷罗人的做法，咨询也不会有太多收获。殖民档案躺在档案馆里，第三帝国时期外交部仅存一个小部门负责相关事务，无人有兴趣阅读旧文件。纳粹本可从殖民游说团体及其支持者那里学习，但他们大多蔑视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的旧精英，视其为德国衰落的代表。他们试图创造自己的精英，而非依赖旧精英。他们本可通过阅读殖民回忆录和分析获取经验，但这些文献从未提及战争罪行、种族灭绝或大规模暴行，反而淡化对原住民的暴行，强调德国士兵的“奉献和苦难”。由于人口结构、意识形态和战略原因，殖民游说团体无法比其他游说团体更有效地影响第三帝国政策。德意志帝国的殖民精英年龄过大，缺乏动员群众支持的手段，无法与纳粹领导层建立沟通渠道传递利益和观点。希特勒及其追随者渴望在东欧征服“生存空间”，而非非洲，殖民问题只是他们希望使英国在欧洲大陆保持中立的工具。⁶⁰ 那些有重新安置、征用土地和种族工程经验的殖民专家，也无需参与从战前波兰吞并领土到总督辖区的大规模驱逐。齐默勒找到的唯一在殖民地和东欧管理均有背景的官员，是前喀麦隆副总督维克托·博伊彻（Dr. Viktor Boettcher），他成为瓦尔塔高（Warthegau）的行政区主席（Regierungspräsident）。⁶¹ 当齐默勒声称前西南非洲殖民者参与东欧殖民“受到德国国家和纳粹党欢迎”，且“非洲的德国前殖民者被视为东方定居的首选，因其‘开拓品质’被认为有用”时，

他再次正确。62 但考虑到 1940 年第三帝国当局组织约 27 万来自罗马尼亚和苏联占领区的人重新定居被吞并的波兰领土，即便其中有来自西南非洲的定居者，他们在新定居者中也无足轻重。63

精英连续性主张背后存在同样的循环推理：是的，冯·埃普在一战后未退出政坛，并在第三帝国时期地位显赫，尤金·菲舍尔成为种族问题权威（战后德国亦然）。64 但考虑到其他殖民者如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后来被自由军团成员暗杀，伯恩哈德·德恩堡（Bernhard Dernburg）加入魏玛共和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弗朗茨·肯普纳（Franz Kempner）战后最初支持冯·埃普，后来成为反希特勒阴谋者并在施陶芬贝格暗杀失败后被处决，这足以支持连续性假说吗？65 在某种程度上，第三帝国是殖民主义的继承者，正如它是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的继承者。这些时期的职业生涯并非都在 1933 年终结。但即便存在 1904 年对赫雷罗和纳马的殖民大屠杀与 1939 年后德国对中欧、东欧占领的联系，也难以通过机构记忆或精英连续性证明。纳粹党和党卫军吸引了一些前殖民者，但更多是非殖民者，Schutztruppe 与冲锋队的联系比战后自由军团运动与冲锋队、党卫军的联系薄弱得多。

需明确的是，这并不排除本文未探讨的其他联系，如德属西南非洲和东欧占领区应用的种族主义和种族工程概念。更广泛的连续性主张（如汉娜·阿伦特将种族和官僚制度与帝国主义联系的概念）无法被本文证据反驳。相反，有大量证据指向此类联系，这将超越德属西南非洲与第三帝国的德国中心视角，扩展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极端暴力如何导致欧洲和其他地区极权政权种族灭绝的理论。还有一个本研究未证明或反驳的假说：学习过程和启发并非仅从德国殖民主义指向纳粹，而是在德属西南非洲、柏林、开普敦和比勒陀利亚的行政和定居者社区之间双向流动，德国殖民主义先启发布尔共和国和开普殖民地的种族隔离，1910 年后又受南非和其他德国殖民地实践和概念的启发。乌尔丽克·林德纳（Ulrike Lindner）的研究指出这种相互影响，列举了德国殖民军官赴南非的“考察之旅”和在多个德国殖民地服役作战的 Schutztruppe 军官间的经验交流。这些分析还揭示，德意志帝国精英和后来的纳粹对英国殖民历史既嫉妒又钦佩。66 在这方面，将殖民暴力与纳粹占领东欧联系的狭隘连续性主张，甚至可能掩盖“谁向谁学习、谁启发谁”的更广阔图景。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07238627655803118>